

# 也要让企业和基层敢说“无事不扰”

易其洋

上周，中央层面通报了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典型问题。其中一起是，2022年，国家管网集团总部(含部门单位)要求下属企业参加会议800余次，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3次。

“一日三会”，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，哪还有时间做事?这让人们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：摊上这样的上级部门，下属企业敢说“不”吗?答案当然是“不敢”;也不由得想到一句话：有求必应，无事不扰。

一些主管部门到企业检查指导、考察调研、参观交流次数太多，让企业深受其扰，烦不胜烦。为优化营商环境，“有求必应，无事不扰”已成各地奉行的一大准则。

说“有求必应，无事不扰”，当然是好事。但如果有些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，非要检查、调研某家企业，让企业赞助出钱，企业怕是不得不照办。原因就是，企业怕打击报复，只能欣然接受，或者花钱求太平。就像中央层面的这次通报，2016年至2023年，江苏扬州市未履行报批程序，共举办7届河豚节，花费

8400万余元，都是靠向所属部门摊派，向民营企业、商业银行等单位及个人拉赞助，由承办河豚节的国有企业垫资弄来的。

同样的道理，上级部门“一天三会”、考核要求一大堆，基层也是不敢拒绝的。原因就在于，考核是上级的法宝，考核分是基层的命根。这次中央层面的通报说，2023年，吉林长春市教育局在不具备创建示范活动开展权限的情况下，开展“依法治校示范校”创建工作，并将上级单位“两年一创建”的频次加码为“一年一创建”，将上级单位下发的98项评价指标层层分解为179项打分标准，导致有的申报学校准备了约1000项评审材料。面对“顶头上司”的违规考核，学校和校长哪有拒绝的胆量?

这样说来，宣称“有求必应，无事不扰”，依然是“上级视角”“自我视角”——我可以无事不扰，也可以“无事照抚”，企业和基层还是没啥话语权和主动权，不敢说“无事不扰”。这恐怕正是是一些地方检查、调研等泛滥成灾，基层陷入“考核异化”之类似形式主义泥潭而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。

我们常说，有些检查调研是必要的，有些会是必须开的，但很少认真地讨论和总结一下，哪些检查调研是毫无必要的，是骚扰企业和折腾基层的，哪些会议只是念念稿子、走走过场、做做样子的，也很少赋予企业和基层对骚扰行为、形式主义说“不”的权利。试想，如果我们既对主管部门、上级部门有“无事不扰”的要求，也让企业和基层有“无事不扰”的权利，情况肯定会大不一样。

今年以来，不少地方出台了直指形式主义“靶座”的举措。2月份，海南省开通涉企活动统筹监测系统，通过“预约制”组织和协调调研，让企业有了对过度调研说“不”的底气。5月份，新疆阿克苏地区公布基层减负“九要九不准”。6月份，广东省制定印发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负面清单》，用12个方面的78条负面清单预防形式主义。7月份，浙江省审核确定2024年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，明确从2025年起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于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前公布……对这类禁止性、限制性的规定，叫好之余，还应该追问一句：企业和基层说出“无事不扰”之后，如果平安无事还好，倘若因此受到无理对待、冷落刁难、打击报复，该怎么办才好呢?

主管部门对企业“无事也扰”，还是因为政府和市场“两只手”的边界和规则不够清晰明确，监管权用起来随意性太大，“暗箱操作”太多，“管得住”与“放得活”的关系处理不当。上级部门对基层干部政绩的考核权和评价权过大，有的甚至能“一票否决”，基层对应接不暇、设计繁琐的各种考核只得“唯命是从”。

让企业和基层敢说“无事不扰”，就需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依法压缩主管部门和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，让所有企业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自由竞争;就要让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考核评价有更多的发言权、决定权，让基层干部只能把精力主要花在为群众办实事上，而不是被杂七杂八的考核指标逼得只能“眼睛朝上”，在“考核焦虑”中疲于奔命甚至不得不“以形式主义应对”。

# 结婚证标注农历日期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

陈广江

结婚证上能否体现登记的农历日期?针对上述提议，近日，江苏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，这个建议合情合理，是可行的;结婚证有法律效力，由民政部统一制发格式，将把有关诉求向民政部反映，提交民政部研究论证(8月28日澎湃新闻)。

此事一经报道，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and 热议。作为重要凭证，结婚证不仅承载着法律意义，也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。结婚证标注农历日期，表面上看微不足道，但实则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义与人文关怀，值得相关部门深入研究论证。

结婚是人生大事，选定的日子往往蕴含深意，不少新人倾向于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，如七夕节这样的传统节日，以寄托其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对幸福生活的共同向往。但现行结婚证上的登记日期仅标注公历，未能直观展现新人所看重的农历日期及其背后的文化寓意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遗憾。上述建议正是对这一细微需求的敏锐捕捉，也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和谐共融的一次深情呼唤。

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文件，结婚证格式与内容需严谨规范，确保全国统一、便于管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承载更多的文

化内涵与人文关怀。在保持其法律严肃性的同时，适当融入传统文化元素，如标注农历日期，不仅能让结婚证成为传统文化记忆的载体，还能让新人在这一重要时刻感受到更多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。

相关资料显示，1997年，《新闻联播》停止播报农历日期，引发社会争议;2007年春节，《新闻联播》恢复已停播10年的农历日期，并延续至今。此外，2007年12月14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，除夕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成为法定节假日——这些节假日与农历直接相关。

从更深层次看，这一提议是对婚姻登记服务人性化、精细化要求的体现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众需求的多元化，婚姻登记已不仅是一项简单的行政手续，更应成为一次充满仪式感、富有文化内涵的生命庆典。在结婚证上标注农历日期，虽是小小改动，却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，能在细微之处彰显对新人个性化需求的尊重与满足，让婚姻登记服务更加贴近人心、温暖人心。

结婚证作为婚姻关系的法律凭证，任何细微的改动都可能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在探讨这一建议时，必须充分考虑法律、技术、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，确保它能得到广泛认同和支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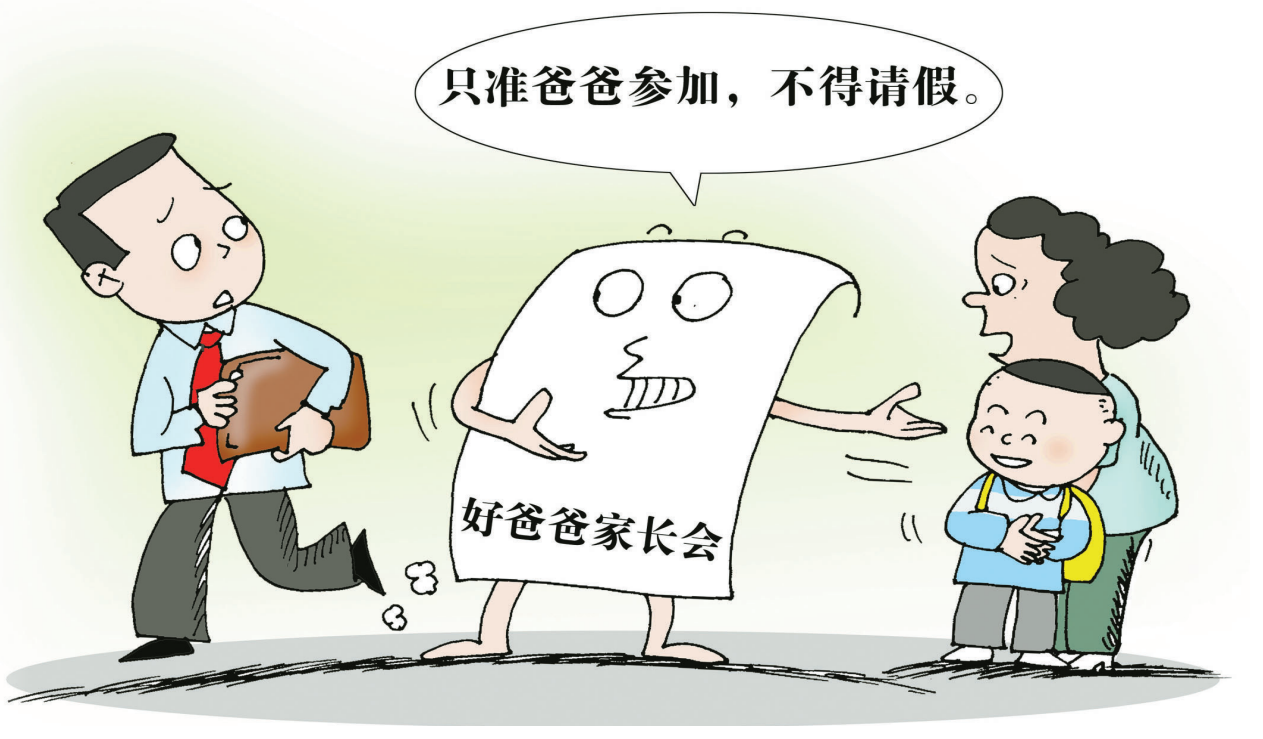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漫画角

### 非你莫属

开学前夕，杭州市采荷中学召开“好爸爸家长会”，邀请初一新生的爸爸们参加，还发布“好爸爸十条”，倡议他们积极参与家庭教育，保持对孩子的关注和耐心，定期沟通、共同制定规则并遵守(8月28日《湖南日报》)。

沈海涛 绘



## “铁头”被抓：“假打”就要被“打假”

江德斌

27日，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发布通报称，近日，该局对董某某(网名铁头)等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立案侦查。经查，2024年5月，董某某、薛某、许某某等人经合谋，以曝黑料相威胁，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，并许诺交付后将提供保护，经多次交涉后获得该主播向其指定账户转账的大额钱款(8月27日澎湃新闻)。

以“打假”闻名于网络的主播“铁头”，这次也栽了。从警方披露的情况看，“铁头”乃是针对某带货主播，以曝黑料为名索要钱财，可见其名义上在“打假”，实际上是在“假打”，就是冲着牟取巨额利益。对于此类以“打假”为名，行“假打”之实，破坏网络秩序、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环境、非法牟利的行为，就该秉持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依法予以严厉惩治。

此前，“铁头”的“打假”短视频如一把利刃，刺向三亚海鲜市场乱象、金镶玉抽奖骗局、老年保健品骗局等，揭开了众多市场黑幕。而在此过程中，“铁头”俨然扮演了正义角色，迅速吸引了大众目光，其粉丝数量火箭般升至数百万之多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“大V”，在职业“打假”主播里风头无两。不过，“铁头”劣迹斑斑，有过多次违法行为，如今被抓，亦给“假打”行为敲响了警钟。

“打假”本身是合法手段，能

够惩治违法商家，净化市场环境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但是，“打假”不能成为非法谋取私利的手段，如果打假人以威胁、恐吓等不正当方式向商家索要钱财，那么就变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“假打”，背离了正义初衷，沦为违法犯罪分子。“假打”往往源于不法分子的贪婪，利用大众的支持，通过编造虚假信息、夸大事实、非法曝光等手段吸引眼球，以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社会中，法律之剑始终高悬，任何挑战法律底线、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，终将受到应有的制裁。“铁头”作为网红博主，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，其遭到法律惩治，亦是一个强有力警示。那些以“打假”为名，在网络上肆意妄为的“假打”博主，需要引以为戒，及早收改更张，别让自己沦为第二个“铁头”。真正的“打假”行为应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，通过合法途径揭露商家的黑幕，打击不法行为。消费者在遇到假冒伪劣产品时，应通过正当途径，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，或者寻求法律帮助，避免采取过激行为或违法手段。

“铁头”等“打假”主播的出现，乃是直播时代的产物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期望。市场的净化与规范，不能只靠“铁头”们，还是需要加强市场监管力量，依法治理市场，打击违法行为，消除市场黑幕，改善售后服务，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消费。

# 选调教师三孩可加分：人文关怀不能牺牲公平

王军荣

近日，江西吉安教育体育局发布2024年县城学校选调教师通知，其中，一项关于“人文关怀”的加分政策提到，“已生育三孩的教师”给予5分加分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对此，吉安教育体育局有关人士表示，国家放开了三孩政策，有三个孩子的教师照顾家庭，这个加分项体现了一种很直观的人文关怀(8月28日极目新闻)。

为彰显人文关怀，选调教师给已生育三孩的教师5分加分。显

然，这5分在竞争中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，甚至可能产生“一锤定音”的效果。对三孩教师予以人文关怀确有必要，但公平不能因此被舍弃。

国家大力鼓励生育三孩，教育部门给三孩教师加分，是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。此举初衷不难理解，但未必合理合法。一方面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只是提出，完善并落实财政、税收、保险、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，其中并未涵盖三孩可加分这一

项。另一方面，这违背了公平原则，对未生育三孩的教师是不公平的。

选调教师，最应看重的是教师个人的专业能力、教学成果以及教学责任心等方面，而生育三孩属于个体的家庭抉择，不应成为影响工作的因素。这么做，有混淆是非之嫌。倘若一名教师平日工作勤勤恳恳，教育教学成绩出色，却因未生育三孩而错失机会，显然难以服众。同时，在制定这一政策之前，是否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，尤其是教师的想法和建议，其程序是否正当，值

得质疑。实际上，这一政策与某些地方实行的父母献血子女中考可加分如出一辙，备受社会诟病。制定加分政策，不能仅凭好心，不能只考虑一方面，需要全面斟酌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最大程度维护公平公正。

支持国家三孩政策，教育部门应为三孩教师提供人文关怀，可以在工作安排上给予一定照顾、提供相应的育儿协助等，而非通过加分来解决。选调教师是件大事，应当建立在更完善的评价体系之上，做到公开透明，保证公平公正。

## 居民小区“分时段让外卖上楼”：小事不小，自治重在善治

卢玉春

鄞州区首南街道锦悦湾社区环球城公寓，原先出于安全考虑，要求外卖统一放入外卖柜。后来，有居民希望外卖小哥送餐上门，由此引发的“口水战”不断。近日，社区权衡利弊后决定，外卖可以上楼了。

社区自治，即小区内居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，内容多是些看似细微的小事。由于大家站位不同、需求不同、利益不同，常常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，一些“小事情”往往成为自治的“难事情”，引发矛盾纠纷不断。

从现实来看，把小区自治好并不容易。小区是所有居民的小区，要自治好，居民就不能有自私自利的行为，不能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小九九——这不行、那不行，既要这样、又要那样，结果却什么事情都干不好，甚至干不了，直接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与和谐共处。

如何处理“外卖是否能上楼”这样的事，锦悦湾社区的做法，值得学习借鉴。

首先，广泛倾听声音。在社区微信群里，让大家激烈讨论，收集各方意见：赞成者认为，若外卖不送上楼，就失去了点外卖的便捷性;反对者则担心，外卖员频繁进出，可能带来安全隐患。

其次，积极权衡需求。组织社区、物业、业委会召开讨论会，充分考虑外卖小哥与居民双方的需求，几易其稿制方案：从第一版的设立外卖架，到第二版的成立保安送餐小队，再到最后一版的分时段送外卖上楼。一次次模拟，一次次优化，最终三方联合敲定外卖配送方案：实行分时段外卖上楼配送服务。

结果，这一方案，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赞成。可见，小区自治，重在善治。遇到公共事务，大家可以坐下来，商量着办，从而找到满足居民需求的最大公约数。

## “科技金桥”实现科创平台和企业双向奔赴

凌波

镇海搭建科创平台和企业实现双向奔赴的“科技金桥”，去年以来，举办“科技金桥”活动近30次，促成科创平台与辖区企业合作签约7项、意向合作45项。

重大科创平台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战场，对突破科学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重要意义。推动科技创新，赋能产业创新发展，离不开高能级科创平台。近年来，我市引进建设了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，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、引领区域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，集聚科技领军人才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阵地，加速技术转化、助推产业升级的重要阵地。

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，产学研合作是科创平台的主要功能和重要使命，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从“实验室”走向“生产线”，实现市场化。但在实践中，科技和产业“两张皮”现象依然存在，科技成果应用和企业需求仍有不匹配、不对接的

情况。一边是企业的转型升级需求，一边是平台的科技成果产出，实现两者双向奔赴，使科技创新更快转化为生产力，需要搭建更多的“科技金桥”，促进各类创新要素的供需对接，高效推动技术交易、产学研对接、成果转化。

实现科创平台和企业双向奔赴，就是一种双赢。对科创平台来说，入企服务，为企业创新开方子，不仅能够助力企业提升竞争力，也是自身科研活动的很好实践操演机会，使产学研合作更有针对性。对企业来说，在科创平台的推动下，能够不断提升产品创新能力，驶入转型发展“高速路”，成为产业链链主企业、单项冠军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进而形成“头雁引领、雁阵齐飞”的科创共生格局。

科创平台和企业双向奔赴，显示了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。搭建人才引进、项目孵化和产业化的“科技金桥”，多多益善，搭建人可以是政府部门，也可以是科技中介，只要能促成双向奔赴，就应该欢迎。

## 让更多高学历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

王学进

来自市教育局的消息，2024年，全市共招聘中小学(幼儿园)事业编制教师2725人，其中硕士研究生732人，占比26.9%;直属学校招聘事业编制教师121人，其中硕士研究生92人，占比76%。今年招聘的新教师人数较前两年有所减少，但新进高学历教师的数量和比例均比2023年有所提高(8月28日《宁波晚报》)。

新进高学历教师的数量和比例逐年提高，符合教育发展的大趋势，也符合中央的大政方针。在电子时代和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小学生的，他们的眼界更广阔，思维更活跃，知识积累和更新更快，个性更加鲜明突出，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也更强，因而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要求更高，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接受新事物、新观念的要求也更高，客观地说(但并不绝对)，高学历教师在这些方面更具优势。

像今年放实中学招进的硕士教师林可寅，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，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，具备扎实的数学专业知识。他说：“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，一个人的个性是他身上最宝贵的东

西。作为教师，不应该磨灭学生的个性，而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个性，使得每个孩子都能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。”应试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不尊重学生个性，因而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，林可寅对应该教育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，对新时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全新的认知和理念。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有个性、有独立人格因而具有个性和能力的人才，正是未来教育应该努力的方向，也是教师应该自觉承担的教育使命。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近日印发《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提出，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，将学科能力和学科素养作为教师教书育人的基础，贯穿教师发展全过程，同时提出，强化高层次人才培养，为幼儿园、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，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。《意见》高屋建瓴，提出的目标既着眼现实，又瞄准长远，意义重大。

招聘高学历教师，是基于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需要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小教育的质量，更好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。